

论萧友梅在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地位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作为学贯中西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不仅创办和推动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及其后更名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健康成长,而且主动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教育经验,融通中西音乐教育智慧,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之路,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不屈不挠的拓荒者。

关键词:萧友梅; 现代音乐教育; 奠基; 借鉴; 融通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1)03-0045-05

萧友梅(1884年1月7日—1940年12月31日)是一位学贯中西、长期根植本土探索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从早年家乡香山的学塾、广州的新式学堂——时敏学堂,继而游学日本东京帝国音乐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到后来远赴德国莱比锡国立音乐院、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到1920年学成归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应聘哲学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1922年改为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导师,主讲和声学、音乐史、乐理等课程,其独特的现代音乐教育理念也在实践中渐次生成。1927年6月,他来到上海,向将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提议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很快得到蔡先生的大力支持。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为院长,萧友梅为教务主任。同年12月,萧友梅为代理院长,次年9月,被任命为院长。在创办和运作上海国立音乐院及1929年改名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13年中,萧友梅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不仅借鉴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教育经验,创造了独具匠心的中国音乐教育管理新模式,而且融通了中西音乐教育智慧,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

育之路,是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一、奠基与推进:从上海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作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萧友梅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即很快投入到其所钟爱的音乐教育事业中去。他在北大音乐研究会及音乐传习所的多年工作可谓不辞劳苦,他开设的“和声学”课程常常是近千人前来听讲,极一时之盛。但遗憾的是,他的音乐教育事业未能得到北洋政府的持续支持,其所服务的音乐教育机构最终也被迫停办。对此,萧友梅忧心如焚,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今天若是还不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关,我怕将来于乐界一方面,中国人很难出来讲话了。”^{[1](P147)}正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萧友梅提议在上海创建国立音乐院,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直接支持,并很快成立。在担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教务主任、代理院长、院长和其后改称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期间,萧友梅竭尽心力,积累和创造了十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

收稿日期:2011-01-07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规划项目“中国社会变迁的教育动力探究”(课题编号:2010BJY002)和华东师大“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书光(1962-),男,福建福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研究。

其一,艰难创业,营造向上氛围。由于当时政府忙于军政要务,国立音乐院开院之初仅获开办费2600元,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只有23名,萧友梅既是教务主任,又是代理院长,教师有王瑞娴、李恩科、陈扈生、吴伯超、朱英、易韦斋、雷通群等先生,庶务及书记各一名。面对国立音乐院的艰难起步,萧先生在开学典礼上风趣地说:“伦敦皇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时,只有二十个学生,八十年后增加到五百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十年后就可以有五百个同学了。”^{[2](P92)}其后不久,国立音乐院改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与磨难。但作为校长,萧友梅总是乐观地面对现实,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人文氛围。他渴望学校有一个理想的安静环境,但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很难做到。对此,他总是风趣地调侃:“搬场”是上海音专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3](P64-65)}正是为了这一“伟大的音专”,萧友梅甘愿最大限度地压缩行政开支,把阳台改造成校长室,用给校长买小轿车的钱添置了学校急用的三角钢琴,学校的行政开支更是随时公开,其大师风范、民主之风令人称道。萧先生的琴室除挂有贝多芬、肖邦、巴赫等照片外,还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岂能尽如人意,下联是:但求无愧于心。这一对联亦生动地折射出其务实求真、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他对音乐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和不懈追求。

其二,罗致名师,严格教务管理。萧友梅深知,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师资。为了聘请到最好的音乐老师,他不惜一切代价,一而再地说服鲍里斯·查哈罗夫——原圣彼得堡音乐院教授,请他诚心帮助中国朋友提高钢琴演奏水平。“音乐院一般教授的月薪是200元,查哈罗夫作为特约教授拿400元”^{[4](P57)}。除此之外,他还请到了其他乐器方面的最好教师,上海工部局的“首席小提琴富华、首席大提琴余甫磋夫及其他首席乐师——请来任教;黄自留美归国不久,他就慕名上门,请他担任理论作曲教授,后来兼教务主任。著名声乐家苏石林也邀任教;语文老师龙榆生,是当时有名的词学专家,英语教师梁就明是留学回来的硕士”^{[4](P59)}。由于名师云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上海音乐教育的高起点,使之很快融入了世界音乐教育的先进行列。与之相应,萧友梅在教学上也提出了相应的严格要求。他在给教务处的一封信中写道:“至选科生照章须候正科有缺额而本校需要时方可录取,但不妨先

准其报名选科(不妨对其声明不一定录取——原注)。前日所谈之被改入额外选科者准其再来考一节,系指其上学期英文或国文无班可入或不及格者言,其完全无希望(如无故一律缺席等——原注)被处分者不在此例。”^{[5](P31)}为了不让学生缺课,萧友梅十分重视课堂教学的合理安排。有一次,他特写信给教务处,指出:“星期六上午有课之学生如每周许其往兰心戏院听乐队练习,似于缺课有关,但查是日有课者颇多高级生(尤其是理论学生),抑设法将上午功课移往下午?”^{[5](P31)}应该肯定,萧先生对教务工作的严格要求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直接促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

其三,建章立制,强化学业考核。为了确保学生的学业进步,萧友梅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其中的“学分与技术升级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即要求学生不仅要修满规定的学分,“还对各专业主科规定‘初级’、‘中级’、‘高级’三个不同等级的技术标准。这三个等级的提升,必须经过由校长、教务主任、专业组主任及主科教师等共同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的‘升级考试’评定合格的才给予‘升级’的证书。取得‘初级考试’合格证书的学生才能报考‘中级考试’,通过‘中级考试’的才能报考‘高级考试’,通过‘高级考试’才可正式给予毕业证书或升入‘研究生班’”^{[6](P224)}。毫无疑问,这一层层筛选的“升级考试”已突破了学分制的樊篱与局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体现了萧先生对中国音乐教育专业化的不懈追求,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四,关爱学生,亲历一线教学。萧友梅不仅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而且对学生充满着慈父般的关心与爱护。甚至在临终前两天,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但他挂念的还是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快考试了,考钢琴的课堂(也就是礼堂),钢琴旁边的板壁上有一条裂缝,一定要用厚纸贴好,否则北风吹进来,如何弹得好琴!”^{[7](P175)}萧先生并非脱离一线教学的校长,他除了要高效地处理好繁重的行政事务外,对实际的日常教学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学生洪潘回忆道:“他不但要事无巨细地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学工作,如招收新生、聘请教师、制定教学计划、申请经费、经费使用安排等,而且他还担任教学工作,几乎全院学生的理论、作曲等课程,都是由他任讲教授。这其中多门课程教材的编写,对学生作业的批

改更是费了他的心血……平时他虽然静穆少欲,不苟言笑,但讲课时却详尽得体,具有吸引力。特别是他在我修改作业时,耐心细致在琴上一遍一遍地视奏,更使我多少年以后追忆这些情景时,还犹如就在眼前。”^{[8](P180)}在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出一位资深优秀教师的光辉形象,其求真务实、恪守职责、严而有爱的教风令人肃然起敬。

二、吸收与借鉴:西方先进音乐教育经验的引进

由于长期在国外留学,萧友梅先生对中西各国的音乐教育有较深入的感受和理解,特别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系统发展和对世界音乐教育事业的独特贡献。但同时,萧友梅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旧乐也要落后于西方七百年。”究其原因,则可能要归咎于中国“记谱法的落后”、“偏重技术”、教授法之泥古守旧等因素。以记谱法为例,萧先生指出:“我们周朝是最重音乐教育的时候。然而,‘成均’(相当乐科大学)的教授同乐官多半是盲人,他们因为没有眼睛,所以他们传授音乐的法子,自然是专用耳朵……我们自从有了这段盲人教音乐的历史以后,不独不改良记谱的法子,并且一路相沿下来,有眼睛的人传授音乐,也用盲人的教法(就是偏重听授),中间有用字谱教的,也不过记其大概……所以中国的好乐曲都因此失传了。”^{[9](P165-166)}相反,西洋自9世纪以后“发明谱表,记谱的法子一天进步一天,15世纪以后的音乐,都能保存,并且演奏能统一,同一个乐曲,处处人人奏法一样,这就是讲究记谱法的结果……所以伯牙因为钟子期死了,就不再弹琴。”^{[9](P166)}由于没能把伯牙的乐曲很好地记录下来,后人也就失去了欣赏其美妙音乐的机会。

针对传统音乐教育的落后,萧先生极力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音乐教育理念,对其丰富的音乐教育实践经验进行合理地吸收、借鉴与改造,努力做到有所发展与创新。为了让学生尽快了解并进入西方的音乐教育前沿领域,萧友梅特撰写《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对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情况进行深入探索,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西方音乐教育经验的赞赏、感悟和理解,并借此对漠视音乐教育的当时政府诸公提出批评。他坦诚地写道:“可惜有教育实权的诸公,知道近代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情形的还是太少,所以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之后,又改组为音乐专

科学学校,不能照最初核准的预算逐渐增加,反而把地位降低一等,这就可以证明对于音乐专门教育,近来尚未容易多得实在内行的人。所以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把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的沿革概况,略为说一说。一来可以给教育当局参考,又可以证明欧洲音乐教育不独不因欧战而缩小范围,并且大战之后扩大规模,提高地位。”^{[10](P349)}

萧友梅并非平铺直叙地介绍欧美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院,而是对其中成绩显著者给予特别赞赏。如论及法国的音乐院时,萧先生指出:“该院的教务委员会(或译审查委员会)是由最有名的教授及特别委员组成,编定教授的程序,对每门功课均极细心地规定好一种的课本或教授法。学生有修了一门或毕业全科资格的,才可参加一种比赛考试(今译会考),这种比赛考试委员会的组织,由院长担任主席,其他各委员多半聘请校外乐界名流(不一定是本院教授)……有这种的组织和严格的比赛考试与种种奖励,所以能够人才辈出,而得到乐界最高学府的地位……学生入学之后,在三年之内假如连一个记名奖(accessit)都考不得,只有自动退学。学校绝不希望多留进步太慢的学生,把宝贵的学额占住,使有天才的候补者不能进来。有这样严格的章程,所以能够把不甚努力、成绩较差的学生逐渐淘汰去,因此产出的人才(指考得头、二奖的)可以说全是优秀分子。巴黎音乐院能在世界音乐院中占第一个位置全在于此。”^{[10](P354)}

至于德国的音乐教育经验,更得到萧先生的极大肯定和赞誉。他说:“德国政府不独不因为欧战而缩小范围或归并停办,反而扩大预算增加科目,可见德国人的重视音乐教育了。最近音乐大学分作四系:(1)理论作曲系,(2)歌乐系,(3)乐队乐器系,(4)钢琴风琴系。各系主任都是第一流乐界巨子。”^{[10](P359)}

欧美各界的音乐教育经验可谓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就其教育制度而言,既有年级制又有选科制。“年级制规定若干年毕业,但未修足某年级规定的功课时,照章应留级一年;选科制之规定某科的标准,而不分别年级。英、美多采用年级制,德、法、比各国多采用选科制”^{[10](P373)}。至于考试类型,也是分定期考试与比赛考试两种。同时,还普遍实行了学位制,包括音乐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应该肯定,欧美音乐院属于大学性质,甚至还设立了研究院。因此,当上海的“国立音乐院”被降低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萧友梅愤愤不平,无法理解,他首先感受到

的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弱化和被歧视,以及与世界先进音乐教育发展方向的脱轨。他说:“无论如何,音乐院的地位完全和大学相等,它的研究院且在大学之上。一般人不明其中组织,把音乐院当作一种中等职业学校看完全是一种误解。”^{[10](P374)}

三、融通与追求: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

萧友梅并不讳言对欧美先进音乐教育经验的推崇和借鉴,明确指出“国乐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吾国向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以致音乐教授法未加改良,记谱法亦不能统一。”^{[11](P416)}。同时,也正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现代化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无法获得大量合格的音乐人才和音乐师资,以至于整个国民音乐水平无法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6](P217)}。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萧友梅从回国之日起,即致力于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与建设。早在1920年,他就与杨仲子等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音乐体操科,次年又将音、体分设,并直接促成了1922年新学制中“音乐课”的设立。1922年,他建议并改组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我国第一所附设于大学的规模最大的相当于一个系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12](P298)}。1927年11月,他在蔡元培先生支持下所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更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所独立建制的正规化、专业化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揭开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新篇章”^{[12](P299)}。

长期留学国外的学术背景,以及对欧美先进音乐教育经验的大力吸收与借鉴,曾一度给人以“全盘西化”之嫌。其实不然,他在上海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期间,特别规定:“专修钢琴、理论作曲专业的学生均必须选修一种民族器乐作为副科。其中像丁善德、贺绿汀、刘雪庵、谭小麟等还达到了相当精通的程度。又如关于文化必须课的学习,他既规定了学习音乐的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英语或法语(学习声乐专业的学生还必须学习意大利语、德语)等外语课,还规定了相当分量的学时要所有学习音乐的学生认真学习古文、古代诗词等课程,并聘请了在古代诗词上有相当造诣的国学导师(如易韦斋、龙榆生等)给学生教课。萧友梅自己还对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的乐制、乐律等等都进行了长期的认真研究,并逐渐将其纳入自己的教学。”^{[6](P219-220)}很显然,萧友梅是秉承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北大办学传统

精神,并致力于中西音乐教育的汇合与融通。

关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发展方向,萧友梅依据其深厚的中西学养和教育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很有独特价值的见解。当有人问及“中国音乐之复兴当循何途径”时,萧先生说:“与其说复兴中国旧乐,不如说改造中国音乐较为有趣……说到改造,就要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所以一切技术与工具须采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至失去民族性。”^{[13](P465)}在他看来,中国新音乐的挺立是离不开本土化的“中华民族的特色”。他强调:“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13](P467)}

那么,应该如何“复兴国乐”呢?对此,萧先生颇能洞察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潮流,并能立足本土国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与计划。具体而言,包括有七条纲要^{[14](P540-541)}。

1. 确定国乐之定义,并确定复兴之步骤。

2. 训练学生,使之切实认清国乐之三个因素,区别其轻重,并教以如何将第二及第三因素隶属于第一因素,作为其躯壳与工具(按第一因素为音乐之内容,第二因素为音乐之形式,第三因素为音乐之演出)。

3. 训练学生,使之深切了解我国固有之德性及目下国情,培养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家必具精神、思想与情绪。

4. 训练学生,使之明了现代音乐形式,并教以如何将其精神、思想与情绪,发挥于相当形式之中。

5. 训练学生,使之获得演奏乐器及唱歌之技术,并教以如何应用技术以表现其精神、思想与情绪。

6. 训练学生,使之明了现代中国国乐与旧乐之不同,并启发其创造新国乐。

7. 训练学生,使从旧乐及民乐中搜集材料,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础。

事实证明,萧先生所致力的新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材——如器乐方面的李献敏、裘复生、丁善德、易开基、朱崇志;声乐方面的喻宜萱、孙德志、朗毓秀、周小燕、钱仁康等。这些人材中,有的在在我国新音乐的建设、运动、创作、教育等各条战线上均起着骨干作用;有的在创作于演奏上,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的影响也誉满欧美乐坛的”^{[15](P80)}

至于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音乐教育在国难期间的实际作用问题,萧友梅敏锐地指出:“在这国难期间,如环境许可时,应尽力创作爱国歌曲,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挥,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可以应用出去,方可证明音乐不是奢侈品。”^{[13](P467)}萧先生这一关注社会时代特征的真知

灼见,以及他所创作的《卿云歌》、《华夏歌》、《国难歌》、《从军歌》等爱国歌曲,发自肺腑,正气高雅,动人心弦,深为广大军民所喜闻乐见,对特定时期中国的社会历史进步和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养成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萧友梅·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2] 萧淑娴·回忆我的叔父萧友梅[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3] 陈洪·忆萧友梅先生与抗战初期的上海国立音专[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4] 丁善德·难以忘却的回忆——怀念萧友梅先生[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5] 鸿倪·萧友梅先生五年祭[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6] 汪毓和·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萧友梅[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7] 陈洪·校庆声中忆萧故校友梅[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8] 洪潘·喜迎校庆忆当年[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9] 萧友梅·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10] 萧友梅·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11] 萧友梅·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12] 苏虞民·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为萧友梅逝世五十周年而作[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 [13] 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14] 萧友梅·复兴国乐之我见[A]·萧友梅音乐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15] 刘雪庵·闻上海音乐学院为萧友梅先生树立铜像有感[A]·戴鹏海,黄旭东·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

Xiao Youmei and modern Chinese music education

HUANG Shu-guang

(Institute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Xiao Youmei is a well-learned Chinese musician, who helps set up Shanghai National Conservatoire, (later renamed National Music Academy). He is a pioneer, enthusiastic about combining the western experiences and Chinese wisdom in a music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Xiao Youmei; modern music education; foundation; borrowing; combination

[责任编辑 范玉凤]